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刘迎秋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两个先行”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全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导新时代我国 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推动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省第十五次党代 会提出,未来五年,浙江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奋力推进“两个先行”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本报今起开设“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两个先行’”笔谈专栏,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解读,敬请关注。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进行的集体实践、凝结起来的智慧结晶,也是习近平本人深入社会、深入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与探索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厚重基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落脚点共同富裕,前提则是高质量发展。把高质量发展放在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标的前面,突出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具体展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力量是生产力及其持续高质量发展。突出强调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不仅充分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立场及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内涵。逻辑和实证均充分表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厚重基石。

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直观表达和具体

体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早在2005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接见浙江省与中国社科院合作项目“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课题组全体成员时,就曾深思熟虑地谈到:我经常想,浙江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与韩国差不多,但浙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及韩国,什么时候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超过韩国呢?确实,浙江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韩国为10.32万平方公里,两地地貌也都是多山地和丘陵。到目前为止,浙江人口6540万,韩国5175万。早在2002年浙江GDP总量跃居全国第四位、达到8000亿元时,韩国GDP已经约6300亿美元。到2021年,浙江GDP总量追赶至7.35万亿元、为2002年GDP总量的9.19倍,韩国则达到了1.79万亿美元、为2002年GDP总量的2.84倍。浙江人均GDP虽然于2002年跃居全国各省区前列,为0.2万亿美元,但那时的韩国已经是人均1.32万美元。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到2021年,浙江人均GDP为1.75万亿美元,是2002年的8.75倍,韩国也进一步上升至人均3.47万美元,是2002年的2.63倍。浙江始终以持续高于韩国的速度高质量发展。这个实践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提出的想法有加速实现的可能。浙江承担着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任务,即“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浙江始终保持当前的速度高质量发展,将会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更好的物质基础。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正确高效的 路径选择。例如,是片面强调和坚持少数人先富,然后再鼓励“先富带后富、帮后富”,还是简单粗暴地搞“杀富济贫”或整齐划一、一刀切式地重搞“平均主义”?是既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政府政策、坚决防止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现象,同时又积极努力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由此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把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放在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即高收入者收入过高问题上,还是放在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就业和不断提高高

收人群收入水平并由此持续缩小“实际收入差距”上?路径选择及其方向不同,政策实施和发展实践的效果和结果必然不同。比如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慈善(也有说讲自愿、讲社会责任等),这些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普遍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不可违背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我们既反对片面甚至一味坚持“少数人先富”,也反对违背规律搞“平均主义”,更不赞成“杀富济贫”。我们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先富帮后富,主张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两极分化,甚至阶层固化,倡导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根本在于要坚持用科学系统的办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要义所在。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我国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而且各省域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差异。例如,到2021年底,我国GDP总量虽然已经达到114.37万亿元,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浙江人均GDP已多年超过1万美元,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也已降到远低于全国的1.94。《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要缩小到1.9以内,设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但与2021年已经达到的倍差相比,缩小幅度仍然偏小。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必须分阶段、分地区、分先后逐渐实现不同水准的共同富裕,既不可能一蹴而就、整齐划一同时达到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整齐划一地使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这里,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所讲的虽然是实现的时间和能够达到的富裕水准,但它所体现和表明的是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不坚持这样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和

共识,不实施这样一种安排和采取这样一种行动,急于求成,甚至试图一蹴而就,既不符合我国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也不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还必须大力度持续鼓励致富带头人积极带动广大民众勤劳致富的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这不仅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亮点,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浙江创新发展40多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浙江作为资源小省,能够于2002年就实现GDP总量跃居全国第四,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21年和第37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成为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强省,原因和诀窍虽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民富省强”。浙江不仅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而且长期坚持实施既强调均衡协调又突出重点发展的“八八战略”不动摇,还长期坚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长期坚持并始终努力践行“经济民本多元、社会包容有序、文化自强创新、政府服务有为、党建坚强有力”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经验不动摇。

当前,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正如如火如荼。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不仅需要继续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一部分人勤劳先富,同时还需要继续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促后富,尤其是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和善于经营的致富带头人和广大民营企业进一步昂首挺胸、凝心聚力、放下包袱谋发展。浙江广大致富带头人和民营企业,尤其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勇立潮头,看准市场发展大方向,抓住产业转型升级新重点,跟上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大步伐,着力在高新关键技术、现代智能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技术、数字化模块化现代强链技术、现代生产和生活服务平台技术等产业尖端与发展头部领域开拓进取,再创新先富带帮促后富、共谋浙江发展新业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

专家观点

张彦

“浙江有礼”意在知礼重礼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从古至今,对“礼”就有“伦理规范与典章制度”合一的传统观、钱穆先生的“准则观”、郭齐勇先生的“系统观”、“缘饰化了的”“社会”“生活观”等不同理解,也有在此基础上延伸拓展的外延多样、内涵丰富的礼育、礼教、礼治、礼秩、礼制、礼遇、礼仪、礼俗等。总的来说,“礼”是人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建构,是规范人们言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治理、展现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浙江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有礼”一直是浙江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基因。对中华优秀“礼文化”与“有礼”浙江传统的时代性继承以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推动“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的重要历史基础。“浙风十礼”在“浙礼”中看见文明中国,是时代赋予浙江文明新实践走在前列的历史使命。

“浙江有礼”贵在“文明的实践”

“以人为中心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文明观的核心要义,也是“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的理论指南。马克思文明观始终建构在唯物史观之上,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提供科学的构想和方法论指导。“浙江有礼”要以“文明的实践”为中心,确立三大维度:第一,人的物质实践构成文明产生的根本动力。浙江省之所以能够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和发达的生产力是强大的基础,这是根本动力;第二,人的发展程度展现了文明进步的历史性和复杂性。文明实践过程必然会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应在马克思文明观的指导下,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抓住文明发展与“人之有礼”的主要矛盾,处理好战略和策略之间的关系;第三,人的全面发展彰显文明发展的价值关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浙江文明实践要从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内生性和精神创造力的解放,注重对人的精神文化性的培育,使每个人成为自觉的主体。

“浙江有礼”要在“人的现代化”

浙江有礼的价值内核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西方学者于20世纪中叶提出的“旧命题”,也是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的“真问题”。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现代社会要有效地发挥作用,人们必须具备某种品质、态度和价值观念。他通过跨文化研究概括了个人现代性12个方面特征,特别强调了四点:参与性公民、个人效能感强、高度独立性和认知弹性大。总的来说,“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将贯穿中国现代化全过程。以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为集中体现的“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表现。“浙江有礼”文明新实践,要集中回答精神文明建设在何种程度、以何种导向和方式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并以文明新实践推动人的观念、素质、能力、行为的现代化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浙江有礼”重在“省域新探索”

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也要立足本省的创新实践;既要有省级的顶层设计,也要有市县各地的探索推进。“浙江有礼”要努力实现四个提升:经验型向科学型提升。超越从经验、体验角度的实践方式,遵循文明“生成与发展、统一与多样、活力与秩序”的基本规律,科学确定“路线图”、精准制定“任务书”、合理绘好“时间表”,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精神文明高地;形式化向内涵化提升。“有礼”本身具有形式化、仪式化的要素,但实践中还是应该从内涵提升。省域文明新实践既关乎行为准则与道德修养的个体性养成,更聚焦社会面貌与文明风尚的整体性提升。它不是单个部门的“专题事”,而是关于全社会的“大家事”。要将积极倡导和有效治理结合起来,加大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强化法律法规保障作用,可以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文明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推动“浙江有礼”成为综合施策、全员关注的标志性成果;运动式向生成式提升。文明实践最终都是润物无声、言传身教的价值熏染和发人深省的价值内化,最终演化成为一种自主自觉意识。因此,在方法选择上,要以工作的常态化抵御“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现象,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落细落小;以工作的生活化延伸空间、凝聚主体、汇聚资源,使文明理念具备可感知的对象、载体与形态;以工作的生动化丰富群众的文明实践体验,将“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做得更加“有意思”“有趣味”。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新书推荐

近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选编》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本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编写,所选的篇目统一按照写作时间顺序进行总体编排,更便于读者沿着历史脉络学习、领会、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在内容上,本书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突出重点,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课堂教学中讲授的经典著作全部选入,以便利读者学习、使用本书。第二,注重系统性,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角出发选取篇目,力争使全书能够系统准确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来龙去脉。第三,观照时代,尽量选取具有时代感的篇目,以期读者通过阅读能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善产业布局、治理方式、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

艺术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莲都探索

郑炜

性,又利于保持城乡的适度分工,推进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具体来看,有以下三条经验:

依托生态,以艺术赋能产业升级。从历史上看,19世纪兴起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城乡结构,使城市开始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乡村成为了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在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中,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从业人口也越来越少,如何提高农业的经济价值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古堰画乡产业发展依托生态、立足农村、惠及农民,产业升级中凸显鲜明的创新赋能和制度赋能。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孵化新产业是创新赋能的关键要素,古堰画乡发挥生态特色优势,推进艺术植入产业,大力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转型。增强村级产业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关联性是制度赋能的内在相连,强化产业关联推进城乡交流,一些中年妇女和老人实现在地性就业,有效遏制农村人口外流,甚至部分城市人口采取流动性居住的生活方式,形成城乡之间常态化互动。

打造生态型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用艺术为人搭建多元生活场景。古堰画乡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规划将关注点从乡村本身转移到村民生活上,以“人”为核心搭建乡村多元生活场景。古堰画乡结合“居民生活半径小,城乡功能混合布局”特点,在规划编制中避免现代都市空间模式的冲击,尽量保持老村落历史地段空间结构的特色和原有道路、水网结构的体系与空间尺度。力求“弹性规划、有机发展”理念,在目前开发的可操作性

改善产业布局、治理方式、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

艺术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莲都探索

郑炜

式现代化”的关系,相对忽视社会整体层面的发展,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群关系等。村落社会资本弱化的问题仍未引起重点关注,大部分村落注重发挥乡贤力量,但几乎没有充分考虑人口外流背景下村落社会资本严重弱化的问题。

城乡要素对流机制尚不完善。乡村生态优势不可能形成于闭环环境,而在于城乡良性互动。目前,通过乡村旅游等方式吸引城市人进乡村只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完善常态交流机制,如乡村养老产业、乡村户籍制度改变等。生态视域下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应聚焦于通过政府政策支持,采取针对性措施,建立城乡对流机制,充分发挥长期以来被种种因素所桎梏的乡村生态优势。

数字乡村建设不够深入。各类App、网上居委会、社区网上议事厅等数字化应用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借助数字化技术,融入乡村需求,打造一批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邻里、文化、健康、生态、创业、建筑、交通、数字、服务和治理等应用场景,实现数字技术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全方位、系统性重塑。

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莲都经验

古堰画乡以艺术植入为基本出发点,通过改善产业布局、治理方式、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等手段,既夯实乡村的发展基础,统筹城乡的协调与均衡

改善产业布局、治理方式、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

艺术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莲都探索

郑炜

与未来发展的创造性之间寻找理想切合点,既保持城镇明确的功能区块,又保持传统街巷中功能的适度模糊性,并留有弹性余地,为未来留下足够发展空间。

结合品牌打造和政策扶持,激发内生造血功能。每个乡村都蕴含着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社会民俗风情,乡村建设需要避免同质化,充分发挥自身特色,打造品牌效应。为了充分体现“山水清佳,风气朴茂”的文化特色,古堰画乡将原有传统的小街区、小尺度的道路及水网作为其发展主题并营造适宜的空间环境,继承原有空间模式,还原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场景。如道路规划契合传统村落结构,在充分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缩小道路尺度,加大道路密度,营造小街区的传统街坊空间等。这种景观规划与设计合理地安排乡村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为人们创造高效、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环境和艺术,也为社会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乡村生活创造。

艺术品牌的精准打造需要政策的持续扶持,一方面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既要持续改善农村水电燃气房等传统的基础设施条件,也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覆盖延伸。另一方面要加强“软投入”,比如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近年来,莲都区围绕“古堰画乡”,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明确“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大配套”相关政策保障,并专门成立古堰画乡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组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牢牢把握住黄金发展机遇。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